

欧美生态社会主义学派视域下的生态经济： 学术文献史的视角

郇庆治

摘要：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反生态本质的揭示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生态特征的阐释构想，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形成的欧美生态社会主义学派所持续关注的话题，它包含着丰富的关于抗拒或替代资本主义反生态的经济制度及其国际秩序的生态社会主义选择的理论论证与愿景构想。但迄今为止，现实中并未出现欧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性质或取向的经济社会绿色变革案例。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虽然可以从过去半个多世纪欧美生态社会主义学派的理论及其对生态经济的讨论中受到一定启发，但仍需我们根据我国实际不断去探索、实践。

关键词：生态经济；生态社会主义学派；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学术文献史

DOI：10.19836/j.cnki.37-1100/c.2021.04.013

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反生态本质的揭示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生态特征的阐释构想，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形成的欧美生态社会主义学派所持续关注的话题。欧美生态社会主义学派理论家的批判性阐述，不仅针对着颇为复杂的言说对象，而且呈现为一个不断演进的动态发展过程。在这里，笔者试图通过一种简略的学术文献史的考察途径，来阐明欧美生态社会主义学派视域下的“生态经济”的理论及政策意涵，是如何得以逐渐走向明晰的，以及它们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一、欧美生态社会主义学派关于生态经济批评与构建的三个维度

就主题来说，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生态批判，是欧美生态社会主义学派理论阐发与构建的起点。对此，约翰·贝拉米·福斯特2002年出版的《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较为详细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反生态本性及其生态帝国主义特征。在他看来，“生态和资本主义是相互对立的两个领域，这种对立不是表现在每一个实例之中，而是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在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中……只有我们愿意进行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才有可能与环境保持一种更具持续性的关系”^①。可以说，这段话构成了欧美生态社会主义学派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必然导致生态危机(衰败)的范例性阐述，即资本主义与生态是根本对立或内在冲突的(这也是该书英文标题的原意)。或者说，资本主义在生态、经济、政治和道德等方面都是不可持续的，而只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变革，才能够在克服生态危机的同时保持经济社会进步。对于前者，福斯特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是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比如增长与资源“脱钩”或“去物质化”)，还是经济管理与能源技术水平的提高(比如“自然商品化”“生态资本”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2018年度重大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18ZDA003)；国家社科基金2018年度重点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18AKS016)。

作者简介：郇庆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1；qzhan@pku.edu.cn)。1987-2009年就职于山东大学，先后担任《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教授。

^①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前言第1页。

和“绿色技术”),都不会从根本上扭转其工业和资本实现积累的结构或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将使得自然生态日益屈从于商品交换的需要或资本增殖的逻辑,从长远来看会不可避免地对生态环境产生灾难性的影响。相应地,资本主义与生态的这种内在性对立,注定了人类社会面临着生死存亡抉择^①。对于后者,福斯特提出,人类的未来在于一场针对并最终取代资本主义制度或生产方式的“社会和生态革命”——即“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改造社会生产关系”,从而引入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不可能提供的关于人类持续干预自然的“理性制约措施”,并致力于满足人们的真正需要和社会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②。此外,他还特别强调,致力于生态转型和创建可持续发展社会的生态社会主义变革,需要用崭新的民主化国家政权和大众权力之间的合作关系,来取代原来的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庇佑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尝试“从正面而不是负面取代资本主义”的各种现实可能性,尤其是找到一条通往更理性的经济社会形态的路径——这种形态将不再建立在以人类和自然为代价的积聚财富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公正与可持续性的基础上^③。

相比之下,萨拉·萨卡 1999 年出版的《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则更多基于“增长极限范式”而阐述了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与道德两个层面上的不可持续性,或实现绿色自我革新的不可能性^④。对于前者,萨卡认为,无论是执迷于“自由市场的典雅与美德”的生态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他们相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部可以利用的经济手段和机制尤其是价格机制是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最好手段),还是迷恋于国家干预的积极作用的生态凯恩斯主义者(他们相信可以借助国家行政的力量来促进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与绿色经济的发展),都无法实质性地克服一系列基础性难题。因而,在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基于可再生资源(能源)的稳态经济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我认为,这些解决方案(往往被概括为‘工业社会的生态重组’或‘生态社会的市场经济’——笔者注)都是幻想。”^⑤对于后者,他强调指出:“如果稳态的或生态的资本主义获得预期成功的基本条件是道德的提高、合乎伦理的行为与合作——我相信,对任何类型的资本主义而言,这些条件都是不可能满足的,因为它们与资本主义的本质相矛盾。”^⑥因而,绿色资本主义信奉者或迷恋者的各种善良愿望和主张,由于与资本主义的本质相矛盾,都是无法真正实现的。换言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不可能自动实现从资本主义增长范式中的有序撤离,或向社会主义稳态经济的渐进转型。

安德列·高兹 1991 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对苏联的经济模式及其生态环境破坏后果,做了较为集中的反思性讨论。在他看来,苏联所遭受的实践挫折表明,它所基于的整体统一性社会的预设,是与日益差异化、复杂化和专业化的现代工业经济发展不相一致甚或矛盾的。尽管如此,他坚持认为,始终致力于超越资本主义而斗争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曾经是(正如我接下来试着指出的),并且今天仍然是限制经济理性的辐射范围,换言之,即限制市场和利润逻辑,使经济和技术沿着经过深思熟虑与民主辩论的模式与方向发展”,而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则在于“保持……经济的相对独立,同时不放弃对经济和技术发展的重塑,引导其走社会—生态之路”^⑦。换言之,在他看来,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生态重建的政治意涵是,将经济理性(重新)置于生态—社会理性统摄之下,尤其是重构我们的生活世界,而不简单是带有专断和技术官僚色彩的国家干预,并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性质的多样化劳动及其机会的合理调配。

不仅如此,高兹还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着力于生态重建或“生态现代化”的 1989 年《柏林纲领》,

①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第 17 页。

②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第 72、96、71 页。

③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第 72、128-129 页。

④ 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张淑兰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8-24、174-223 页。

⑤ 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第 4 页。

⑥ 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第 221 页。

⑦ 安德列·高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迷失与方向》,彭姝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年,第 10、13 页。

虽然提出了关于经济各领域尤其是工农业系统、交通运输系统、技术体系进行生态转型的系列政策主张,从而显示了其经济的生态现代化转型前景的乐观一面,但也凸显了这其中如何协调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之间的内在冲突、如何妥善处理生态重建带来的“去劳动(物质)经济”后果等难题。总之,在他看来,“生态理性以‘生活得更好但劳动更少、消费得更少的社会’为目标。生态现代化要求投资不再服务于经济增长而是经济减速,即缩小现代意义上的经济(译文是生态——笔者注)理性的辐射范围……当这些新的标准在公共政策和个人行为中战胜资本逻辑、使用非经济目的手段将经济理性置于次要地位时,资本主义便会被超越,从而诞生一种不同的社会乃至文明……即在不取消资本的自主性和逻辑意义的前提下,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消灭”^①。

相形之下,萨拉·萨卡的《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则借助于对苏联经济的生态批评与反思,系统阐发了一种“生态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点。在他看来,“一种真正的生态经济只能在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运行”^②。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经济或生态经济的真实确立,离不开一种社会主义的制度环境或条件。相应地,这种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它不仅意指有待继续创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形式(比如自然资源和生资料的公共所有制、计划和配给),而且意味着或代表着一种全新的价值观(比如平等、合作和团结)。他特别强调:“我早就认为,我们应该期望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这不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现在或过去能够比资本主义的效率,而是因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比资本主义的更胜一筹。仅仅基于这一个原因,人们就可以拒绝任何的资本主义政策。”^③

至于生态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的具体样态或内容,萨卡认为,它首先不应是主张将(微观)市场(机制)与(宏观)计划(手段)的简单结合。因为,“我想表明的观点是,这种或那种类型的混合经济都不是向一个可持续的社会转型的正确框架”^④。不仅如此,萨卡认为,“生态主义的社会主义”意味着必须更加严肃地对待社会主义的这一“生态”前缀,即生态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挑战性意蕴,尤其是强调不仅存在着资本主义社会与生态之间的内在矛盾,还存在着任何工业社会(以及人口增长)与生态之间的内在矛盾;相应地,晚期(发达的、工业的)资本主义社会必须经过一个大规模的经济收缩过程(阶段)之后,才有可能转变到“生态的社会主义”。因而,在他看来,“生态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核心观点包括:“世界经济与社会都必须变成可持续的”;“为了实现可持续性,工业经济必须收缩,从而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要让人民接受经济收缩政策,最好的方法是平等”;“撤退必须是有计划的、有秩序的”;“道德提高,一个道德的经济和社会,都是实现可持续性所必需的”^⑤,等等。

相对于前两者,欧美生态社会主义学派对“生态自治主义经济”的批评,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议题。总体而言,其一,在哲学价值观与政治哲学层面上,欧美生态社会主义学派所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及社会结构分析方法,他们强调导致生态环境难题或危机的人类社会经济结构成因及相应的解决思路,而不是过分看重社会个体价值观和行为变革的重要性,尤其反对各种形式的生态(生命或生物)中心主义。其二,对于未来社会的构想及其过渡途径,欧美生态社会主义学派更多强调基于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现状及其趋势的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或替代,并坚持认为这一变革将同时是“红色的”和“绿色的”,即将会在解决社会压迫或不平等的同时实现最大程度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公正,至少会从根本上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所发生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因而,“最好的绿色战略是那些设计来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战略”^⑥。这意味着,欧美生态社

① 安德列·高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迷失与方向》,第52、113页。

② 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第5页。

③ 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第174页。

④ 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第241页。

⑤ 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第248页。

⑥ 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37页。

会主义学派的“红绿”哲学与政治，预设了一种不同于生态自治主义者的“深绿”哲学与政治统摄之下的“生态经济”，其中包括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体系的革命性重建、对经济与社会分散化的有限赞同、以城市地域发展为中心、对市场货币和国际贸易的较为宽容或肯定态度^①，等等。

可以说，大多数欧美生态社会主义学派的学者——比如安德列·高兹、詹姆斯·奥康纳和戴维·佩珀，都依此对“生态自治主义经济”的分散化、自主性和软技术等特征提出了自己的批评，认为它们很难成为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经济的社会样态或基础。比如，高兹着重阐发了现代科技及其革新对于生产劳动的社会文化变革意义或解放潜能^②，而奥康纳则明确肯定了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国家等行体及其计划(或规制)的作用^③。因而，长期以来，欧美生态社会主义学派的主流性观点是，生态社会主义未来社会条件下的经济，将会比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经济更加富裕公平，管理上也更为顺畅有序，至少不会是相反。而其代表性看法是，国家将不会成为反应能力差的、压迫性的和过度官僚化的制度机构，而是会与经济、社会构成一个结构复杂的相互作用的整体。

但也必须看到，几乎所有欧美生态社会主义学派的学者，都面临着如何(重新)界定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前缀的准确意涵这一难题甚或挑战。对此，有些欧美生态社会主义学派的学者像戴维·佩珀，所采取的是诉诸挖掘或阐发社会主义的自治传统，而其他人像默里·布克金和萨拉·萨卡，则着力于重释或吸纳生态的科学意涵。比如，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中专门提到了威廉·莫里斯，认为他在大量论文和演讲中，概括了今天可以称之为生态社会的基本原则：致力于与自然和谐相处、简单的生活风格和小规模工厂中进行的既有有用又美观商品的劳动——一种清晰的共同体感贯穿于他的地方自治观点^④。再比如，布克金 1982 年出版的《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与消解》所系统阐发的“社会生态学”，其直接批判与变革对象始终是明确的，即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制度。布克金指出：“对于社会生态学家而言，我们目前面临的环境失衡深深植根于一个非理性的、反生态的社会，而它面临的基本难题是不可能通过渐进的和单一议题性的改革来解决的”^⑤，“对于我来说相当明确的是……如果这种社会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与自然间的分配……而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一个听命于‘增长抑或死亡’原则的社会：资产阶级出于资本扩张和人类剥削目的不断强化竞争行为，推动着将有机社会降低为无机社会。资本主义已经使得社会进化与生态进化很难相容”^⑥。可以看出，他分别于 1991 年和 2005 年撰写的另外两个前言中的这两段话，都清晰展现了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它的反生态本性的严厉的社会生态学批评。

由此也就可以理解，布克金晚年更加强调的“自由进步市镇主义”话语体系下的“市镇自治经济”，其实是一种与基于差异、整体性和互补性等生态理念或原则而不是任何形式“中心性”的生态社会相一致的新经济。也就是说，与其他生态自治(区域)主义者不同，他认为，市镇经济本身的分散化(自治公社及其所组成的复合性网络)、适当规模(更加手工艺性而不是工业化的生产劳动)和软技术(适应本土生态环境特点并遵守自然的“循环法则”)等要素或特征固然重要，但更具决定性的是统摄与框架化着这些要素或特征的新型生态感知、生态社会和政治实践^⑦。我们可以依此批评他对马克思主义立场与观点的偏离，但更为直接的质疑却应是，他的确没有阐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比如欧美社会)究竟如何实现这样一种比经济转型更为艰难的社会重建，而其主要基于新英格兰地区历史传统与当代社会政治动员实践的思考，似乎也不足以支撑这一点。

① 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第 318-319 页。

② 安德列·高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迷失与方向》，第 6、118 页。

③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433-434 页。

④ 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第 93-94 页。

⑤ 默里·布克金：《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与消解》，郁庆治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 年，1991 年版导言第 2 页。

⑥ 默里·布克金：《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与消解》，2005 年版前言第 5 页。

⑦ 默里·布克金：《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与消解》，1991 年版导言第 51 页。

二、欧美生态社会主义学派的生态经济批评与构建的四个阶段

从动态演进的视角来看,在1970-1980年代,安德列·高兹、威廉·莱斯和默里·布克金等人,最早开启了欧美生态社会主义学派关于“生态经济”的讨论。而这些讨论的突出特点是,对于“生态经济”及其社会的构想阐释,明显受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迅速兴起并盛极一时的生存主义学派(以1972年发表的两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和《为了生存的蓝图》为代表)的影响。

在1976年首次出版的《满足的限度》中,威廉·莱斯从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所提及的“稳定状态”概念出发,探讨了一个“易于生存社会”或“节俭社会”的前景。他认为:“在经历了又一个百年‘发展’之后,我们能够针对社会变革的决定性方向给出一个比密尔能够给出的更为准确的一般性指导方针。如果一些工业发达国家的目标是降低商品在满足人类需要中的重要性,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均能耗与物质需要,则这些国家的社会政策总体效果就是易于生存社会的形成”^①。

莱斯还强调指出,一方面,这样一种替代性社会政策的目的或替代性社会追求,既不是要让一大批人口重新回到艰苦的环境中去,也不是要由另一种统一模式来取代目前的垄断性模式。恰恰相反,工业化和复杂科技的积极特点,可能会为当代社会提供过去社会从未有过的奢华享受,即能维持多种不同的生活状况,而这些生活状况对个人来说更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与长期以来关注于“某种社会转型可能会让一切人的劳动和业余时间都含有丰富的空间”的替代性思想流派的核心关切不同,更为重要的也许是尽快制订一套关于“需要”的替代性定义或预设方向。因为,部分作为高强度市场架构的消极方面,“人类需要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问题现在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我们必须把人类需要问题视为生态相互作用这一更大网络中不可分割的一个有机部分”,也即必须做到开明自利地考虑“人类以外的自然的需要”^②。

可以看出,莱斯所批评的对象是明确的,即被物质生产无节制扩大的理想以及支撑这种物质生产的基础设施(更精密的大型技术、更高的能耗、生产与人口的集中化、功能的进一步专门化和商品更繁多的花色)所主宰的社会构型及其变革,也就是现实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体系,但他的替代性方案却明显是相对温和的或折中性的。尤其是,这一作为从与幸福相脱离的定量标准转向幸福的定性标准的“社会政策”的参考性组织框架,究竟具体何指以及如何依此实现“社会重组”,并不十分清晰明确。比如,他提出:“我们的经济与政治制度目前仍旧有灵活性,可以让我们试用可能的替代性选择”;“在我们的社会活动中,我们能够选择如何培植我们与人类以外的自然之间关系的方式,将把我们带到甚至超越于开明自利主义边界的地方”^③,其中散发着浓郁的“生态改良(资本)主义”意味。

1990年代初,安德列·高兹、莱纳·格伦德曼和戴维·佩珀等以西欧为主的学者,进一步推进了生态社会主义学派话语体系下的关于“生态经济”的讨论。而这些讨论的明显特点是,“生态经济”被更自觉地置于已经基本成型的生态社会主义学派的理论框架之下,但却在整体上仍然囿于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背景和条件。

戴维·佩珀1993年出版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包括如下四个理论要点^④:(弱)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生态危机成因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据的分析、社会变革的冲突性和集体行动的方法、关于绿色社会的社会主义处方与视点。相应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社会主义变革,意味着或指向以经济层面为基础的综合性和转型:“一个建立在共同所有制和民主控制基础上的社会,从而提供人类在其中能以生态可接受的方式满足他们需要的框架,生产完全是为了使用而

① 威廉·莱斯:《满足的限度》,李永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29页。

② 威廉·莱斯:《满足的限度》,第130、134页。

③ 威廉·莱斯:《满足的限度》,第137、144页。

④ 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第83页。

不是为了销售和获利。”^①在佩珀看来,英国的社会主义党所描绘的上述未来社会完全可以“绿色的”,因为它将建立在对每一个人物质需要的自然限制这一准则基础上^②。具体而言,他所理解的绿色未来社会中的“生态经济”囊括了如下要素^③:真正基层性的广泛民主;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即共同体成员所有,而不一定是国家所有);面向社会需要的生产,而主要不是为了市场交换和利润;面向本地需要的地方化生产;结果的平等;社会与环境公正;相互促进的社会与自然关系。在他看来,这些要素或主题不多不少地构成了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尤其是它的经济基础。

应该说,佩珀对于上述生态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社会变革的预期是相对谨慎的,强调“直到大多数人确实希望它被创造出来并坚持它的时候,一个生态健康的社会主义社会才会到来”^④,但他对于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生态经济”的描绘多少还是有些理想化的,并因而遭到了萨拉·萨卡的批评。比如,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人们持续地把他们的需要发展到更加复杂的水平,但不一定违反这个准则(即自然的限度——笔者注)。这是一个在艺术上更丰富的社会……它有可能需要更少而不是更多的地球承载能力”^⑤。

2000年前后,詹姆斯·奥康纳、保罗·柏克特、乔尔·科威尔和萨拉·萨卡、乔纳森·休斯等人,从不同视角深化了欧美生态社会主义学派话语体系下的关于“生态经济”的讨论。而这些讨论的主要特点是,以北美学者为主角的地域性特征,多少影响到了他们对“生态经济”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偏重。

保罗·柏克特1999年出版的《马克思与自然:一种红绿观点》和2006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经济学:走向一种红绿政治经济学》,明确地围绕着捍卫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的系统性生态环境观点或“红绿”性质。前者致力于阐明,从一定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特定形式的环境主义,即从阶级关系和人类解放需要的立场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后者则着力于表明,聚焦于作为一种物质—社会关系的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对主流生态经济学做出实质性贡献,并有助于实现其自我设定的理论目标,因而可称为“红绿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与自然:一种红绿观点》开篇就指出:“贯穿本书的基本设定是,马克思关于自然条件的阐述具有一种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和分析力量,而这甚至还没有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著述中得到充分认可”^⑥。柏克特强调,一方面,马克思不仅认为生产是由历史形成的生产者之间关系和剩余价值的创造者与占有者之间关系所决定的,还认为生产作为一个社会与物质过程受到包括人类身体状况在内的自然条件的影响。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是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必要形式,反过来也是一样;二者共同构成了一个贯穿着阶级对立的物质与社会整体。另一方面,马克思不仅承认资本主义提供了人类发展的新可能性,而且还阐明了这些新可能性如何被不断扩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阻断。进而,马克思同时将这一方法应用于阐释劳资关系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关系,以及剖析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强调它也受制于并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剥削与竞争性,并由此促成了对资本主义环境危机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资本主义环境危机的根源、生态斗争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健康而可持续的共同进化的条件。

尽管柏克特确信马克思主义的上述方法与综合性分析,“提供了一种关于当代资本主义以及如今困扰着环境主义者的政治难题的生态社会主义观点的必要基础”,但《马克思与自然:一种红绿观点》的主要目的,是重释这一方法与分析本身,而不是它的应用。基于此,在该书的第三部分,他具体讨论了环境议题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局限性分析中的地位,以及在未来共产主义过渡中

① 英国社会主义党:《生态与社会主义》(伦敦:1990年),第2页。

② 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第355-357页。

③ 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中译本前言第3页。

④ 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第357页。

⑤ 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第337页。

⑥ Paul Burkett, *Marx and Nature: 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pp.1-2.

的重要性^①。在他看来,基于直接联合起来的社会劳动的共产主义生产,再加上还会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对自然使用的更明智管理,将会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经济”和“生态(理性)社会”。

遵循十分近似的叙说思路和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经济学》围绕如下四个核心概念或议题,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红绿”特征:(生态)价值、自然资本、熵和可持续发展。而在第四部分中,柏克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明确区分了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两种环境危机形式——资本积累的危机(即物质供应的危机)和人类发展的自然条件的危机,而且阐明或预示了这种区分对于未来共产主义变革的生态意蕴——伴随着由工人及其联合体的革命斗争所建立的新公社体制而实现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的生产者与自然条件之间“物质变换裂缝”的弥合,从而使这些条件成为促进人类全面自由发展的条件^②。因而,在柏克特看来,聚焦于个体、社会与自然之间协同进化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或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愿景的核心,也理应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讨论的核心。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理论优势或潜能并未被充分意识到,而后来的争论也大都集中在了资源配置方面的信息、动因和效率等技术性问题(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核算”的讨论)。在这里,笔者想强调的是,柏克特的理论论证本身是言之有据、逻辑清晰的,但这就意味着,他所指称的“生态经济”或“生态社会”是在严格意义上使用的,即马克思恩格斯所意指的狭义的“共产主义社会”——“一个在计划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协同工作的社会,致力于确保社会所有成员的生活资料 and 他们的全面发展”^③,而这就更加凸显了其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历史主体”和“过渡机制”难题。

2010年代以来,以乌尔里希·布兰德等人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学者的“社会生态转型理论”和拉美学者的“超越发展理论”等,则更多从全球化视域拓展了欧美生态社会主义学派话语体系下的关于“生态经济”的讨论。

乌尔里希·布兰德和马尔库斯·威森2017年出版的《资本主义自然的限度:帝国式生活方式的理论阐释及其超越》,初步提出并阐发了一种激进的“社会生态转型”观点或“批判性政治生态学理论”,而它的逻辑起点则是,对2008年世界金融与经济危机之后兴起的“绿色增长”“生态资本(技术)”或“绿色经济”话语及其政策的批判性分析。布兰德等认为,一方面,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国际机构、智库所提出的“绿色新政”“绿色经济倡议”“绿色增长战略”和“绿色技术转型”等政策报告,其实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反危机战略”的一部分或“升级版”。因而,它们关于“绿色增长”或“绿色经济”不仅可以摆脱当前的经济(发展)危机、还将会引向一种双赢或多赢的绿色未来的声称,很可能会最终落空。但另一方面,欧美国家经济确实正在发生一种“选择性”绿化,即所谓的绿色经济战略以其他部门和地区为代价来推进或实现,尽管这种高度部门性与区域选择性的绿化,将很难有效解决全球性环境恶化和贫穷难题,更不会促成全新的富足生活形式及其观念。此外,至于少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够做到“鱼与熊掌兼得”——既保持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物质生活水平,也能享受到相对较高水准的生态环境质量,是由于一种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实现全球化的“帝国式(生产)生活方式”^④。

也就是说,布兰德认为,简单重复许多欧美生态社会主义学派学者关于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反生态或不可持续的论点是远远不够的,当代绿色左翼政治还必须认清并立足于新的客观实际,即已然形成并且依托于一种非公正全球制度架构与秩序的生态资本主义或生态资本主义。当然,他并不是要在政治上辩护或认同这一“浅绿色”现实,而是强调,当代绿色左翼政治所倡导与追求的绿色变革,必须同时是伴随着或基于经济全面绿化的激进的“社会生态转型”——同时考虑其社会与生态后果(要求)

① Paul Burkett, *Marx and Nature: 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pp.13-14.

② Paul Burkett, *Marxism and Ecological Economics: Towards a Red and Green Political Economy*, Leiden: Brill, 2006, pp.1-2.

③ Paul Burkett, *Marxism and Ecological Economics: Towards a Red and Green Political Economy*, Leiden: Brill, 2006, p.325.

④ 乌尔里希·布兰德、马尔库斯·威森:《资本主义自然的限度:帝国式生活方式的理论阐释及其超越》,郇庆治等编译,北京:中国环境出版集团,2019年,第9、20页。

的经济绿色转型,而且这种转型必须在全球层面上来推进和发生,尤其是要主动构建一种全球性绿色左翼力量的“转型联盟”^①。也正因为如此,在笔者看来,他所构想的未来社会的生态经济方案,其实是图景尚未勾勒清楚、过渡机制也不够明晰的,而且同时体现在国内与国际层面上——比如如何克服国内层面上的结构性阻力或障碍和实现跨国层面上的不同区域(国家)之间的团结等。

相形之下,米里亚姆·兰和杜尼亚·莫克拉尼 2011 年编辑出版的《超越发展:拉丁美洲的替代性视角》,是 2008 年金融与经济危机之后兴起的、对欧美国家所主导的发展(现代化)话语与政策的全球性批评观点的拉美地区版本。它着力于批判性分析拉美各国长期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径、模式与理念等多重依赖性的困境或悖论,并提出了如何走出这种现实困局的较为新颖而激进的系统性看法,从而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生态转型或“红绿”变革理论。在这些学者看来,一方面,同时由于可持续(绿色)发展话语与政策的欧美主导或“私利”性质和可持续(绿色)发展话语与政策本身的生态帝国主义或后殖民主义本质,国际社会过去 20 多年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讨论与实践并未能够、也不会取得重大成效,而近年来被寄予厚望的“绿色增长”或“绿色经济”也将会遭遇同样的境遇。另一方面,同时由于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社会关系上的“边缘性地位”(相对于欧美中心地区而言)和社会的自然关系上的“悖论性情形”——“资源榨取主义”或“资源丰富咒语”(即自然资源丰富并持续大规模开发但却导致了经济贫困和生态环境破坏),拉美国家往往是短期内世界经济繁荣的热情参与者和受益者,但这种短暂的快速经济增长或福利增加却无法转化成为一种内生性的持续发展动力。对此,阿尔贝托·阿科斯塔概括指出:“自建国以来,拉美主要出口国就未能建立起一套摆脱贫穷与威权主义困境的发展模式。这似乎是一个很大的悖论:这些国家自然资源富饶,甚至获得了价值不菲的现金收入,却未能因此奠定其独立发展的基础,结果是,国家依然贫困。而它们之所以贫困,是因为它们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是因为它们把为世界市场开采自然财富作为发展重点,却忽略了其他形式的基于人力资本的价值创造。”^②

也就是说,这些学者认为,拉美经济自现代社会之始就是一种自然资源经济或所谓的“绿色经济”,但却不得不屈从于资本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同时提供着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自然资源供给和地球生态系统的重要自我更新保障,却拥有一种严重不可持续(绿色发展水平低)的经济、社会与文化。不仅如此,在她们看来,尤其是安第斯地区的国家中左翼进步政府新世纪初的执政实践表明,“21 世纪的社会主义”政治与政策的付诸实施,依然面临着如下难题,即如何将一种源自全球化链条或进程的经济繁荣机遇,转化成为一个更加具有自我成长性的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还几乎无法避免地面临着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将会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和传统社区衰败难题,而这在靠近亚马孙森林周围的自然生态与原住民保护区则更具挑战性。因此,这一“超越发展”理论或学派的基本看法是,在传统的发展视野与模式、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体系系统摄之下,拉美地区不可能实现自主自愿的社会公正与生态可持续发展。因而,除了理论层面上的改弦易辙式的方向性调整——从各种形式的“替代性发展”方案转向寻求基于“好生活”理念与追求的“发展替代”,尽快走出依然主宰着包括左翼进步政府在内的拉美政治的“(资源)榨取主义”,应该成为拉美各国发展重构或社会生态转型的“主战场”。至于在这种总体不利环境下的现实变革路径,许多学者都强调,要逐渐撤出严重依赖性的和不可持续的新(旧)榨取主义。对此,爱德华多·古迪纳斯指出:“首先,有必要尽快将‘掠夺式榨取主义’改变为‘温和的榨取主义’……它有助于我们应对目前所面临的诸多严峻问题;其次,需要转向那些‘不可或缺的榨取主义’,其中只允许那些为了满足国家和地区真实需求而存在的采掘业继续运营……尽管向后榨取主义转变的目的在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但毫无疑问,我们的未来生活将会变得节俭”^③。

① 乌尔里希·布兰德、马尔库斯·威森:《资本主义自然的限度:帝国式生活方式的理论阐释及其超越》,第 145 页。

② 阿尔贝托·阿科斯塔:《榨取主义和新榨取主义:同一诅咒的两面》,载米里亚姆·兰、杜尼亚·莫克拉尼主编:《超越发展:拉丁美洲的替代性视角》,郇庆治、孙巍等编译,北京:中国环境出版集团,2018 年,第 60-61 页。

③ 爱德华多·古迪纳斯:《向后榨取主义过渡:方向、选择和行动领域》,载米里亚姆·兰、杜尼亚·莫克拉尼主编:《超越发展:拉丁美洲的替代性视角》,第 151、159 页。

可以看出,“超越发展”作为一个理论学派,更多地呈现为一种新的发展思维方式甚或意识形态,而很难说已经是关于拉美社会未来发展的完整性理想方案及其过渡战略。而作为一种“红绿”变革战略或“转型政治”,“超越发展”还存在着诸多基础性难题,尤其是如何使这一地区从(资源)榨取主义的渐进退出或撤离而成为一个有组织、有秩序的社会转型过程(类似前文提及的萨拉·萨卡关于这一主题的讨论)。

三、简要评论

应该说,经过上述三个维度和四个不同阶段(或时间节点)的持续性讨论,欧美生态社会主义学派视域下的“生态经济”概念或论题,已经得到内容丰富而系统深入的理论阐述。也可以说,生态社会主义未来社会的经济基础或物质生产生活方式的原则要求与大致轮廓,正渐趋明晰,尤其是在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照的意义上。

概言之,生态社会主义未来社会条件下的“生态经济”,应该具备如下两个最基本特征:一是社会主义的,二是生态可持续的。就前者来说,所谓“社会主义的”,不仅意指新型的自然资源和物质生产资料占有形式(特别是不同于私人所有制的社会公共与共同所有制)与经济活动组织管理方式(尤其是有别于市场体制的宏观计划与资源配置手段的主动运用),还意味着一种基于平等、公正与合作理念和原则的具有明确规约性的社会政治制度构架。相应地,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太可能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关系尤其是私人所有制的革命性废除或替代的自然性结果,而必须建立在经济变革、社会政治变革和文化价值观变革的协同推进与长期历史过程的基础之上。甚至正如萨拉·萨卡多次强调的,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对一种先进于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及其道德践行的社会政治追求。因而,生态社会主义者大都会同意,走向未来绿色社会的关键,并不是如何找到具体性的新型经济样态、管理工具和技术手段,而是创建使这些生态化经济样态、工具和手段实现有机衔接并协同发挥效用的社会制度环境与大众文化氛围。就后者而言,所谓“生态的”,不仅意指某一个公司企业、产品行业或消费者对自然资源的尽可能少的物质耗费和对生态环境的尽可能小的不利影响,还意味着这种生态可持续性考量成为从家庭到社区单位乃至整个社会的构建与运行准则。相应地,欧美生态社会主义学派更为关注的,不是未来社会的物质富裕程度及其解放功能,而是它的合乎生态原则或理性特征,而这这就要求必须同时生态化重建任何依然基于现代工业体系和城市化的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与政治,以及支撑着它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性)愿景和价值文化。这其中尤其具有挑战意义的是,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要想成为合乎生态原则的或生态可持续的,就不太可能允许社会成员进行无节制的自由享受或选择。也就是正如默里·布克金所反复指出的,人类社会必须通过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解来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从而使人的进化和自然的进化相向而行、互促共生。因而,对于大多数生态社会主义者来说,走向未来绿色社会的关键,并不在于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环境本身科学认知的颠覆“三观”意义上的飞跃和自然资源技术经济驾驭能力的脱胎换骨式的提升,而在于新型社会大众共识的民主达成,以及它的不断制度化展现和转型升级^①。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仅仅依据这两大基本特征或上述欧美学者为主的论述,就可以照猫画虎般地建立起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或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经济”。在理论层面上,前文所述的这些欧美生态社会主义学派学者的分析,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还存在着各自不同的缺憾,或者体现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反生态本性及其绿化努力的批判性分析不够全面,或者体现在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的生态特征以及社会政治转型战略的理论论证与阐释的不够充分,或者体现在这二者之间缺乏更严谨、自然、令人信服的过渡衔接。总之,它们都很难直接作为绿色左翼社会政治运动的理论纲领或行动指

^① Victor Wallis, *Red-green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and Technology of Ecosocialism*, Toronto: Political Animal Press, 2018, pp.70-92.

南,也就难以实现他们中的不少人(比如默里·布克金、安德列·高兹、戴维·佩珀、萨拉·萨卡和乌尔里希·布兰德等)所致力于的改造或赋能这些社会政治运动的目标追求。不仅如此,这些理论分析在总体上还明显受制于他们所处的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与文化背景和环境。比如,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保罗·柏克特、乔尔·科威尔等^①,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对苏联生态经济建设的努力及其得失做更全面系统的讨论——往往只是零碎的片言只语式点评,安德列·高兹和萨拉·萨卡所先后做出的理论评析,则显得批评力度有余但建设性不足。

在实践层面上,部分是由于其理论自身所存在的局限性,部分是由于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全球化的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复杂性,这些生态社会主义学派学者的社会与经济解决方案或愿景,其实是严重缺乏现实可操作性或指导能力的,并往往呈现出明显的政治折中性或者未来乌托邦色彩。比如,威廉·莱斯、安德列·高兹、乌尔里希·布兰德等对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生态批判,最后都落脚于对这一经济制度或体系引入更多或更自觉的社会与生态理性规约,也就是对它进行和平渐进的“社会生态转型”而不是革命性的社会主义替代,其政治折中性是非常明显的,而戴维·佩珀、乔纳森·休斯和保罗·柏克特等对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经济的生态特征或优势的描绘^②,则在很大程度上立足于对社会主义的系列应然性品性的信奉或自信,其政治乌托邦色彩也是显而易见的。

总之,欧美生态社会主义学派的阐述,包含着内容丰富的关于抗拒或替代资本主义反生态的经济制度及其国际秩序的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论证与愿景构想。但迄今为止,现实中并未出现欧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性质或取向的经济绿色变革案例。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虽然可以从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欧美生态社会主义学派的理论及其对生态经济的讨论中,受到一定启发,但仍需我们根据我国实际不断去探索、实践,而不能奢望从他们的研究中获得现成或完整的方案。

The Ecological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Ecological Socialism School: An Academic Literature History Approach

Huan Qingzhi

(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P.R.China)

Abstract: Systemically criticizing the anti-ecological nature of capitalism and interpreting the environmentally-friendly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ism is a long-term-focused theme of eco-socialism, which was formed in the late 1960s and early 1970s in the US and Europe. While these expositions are very rich regarding the theoretical and political envisions of eco-socialist alternatives in the process of resisting or replacing the anti-ecological capitalist economic system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one cannot find any real case in today's world which aims to carry out a socialist green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typical conditions of developed capitalist society. The on-going efforts of socialist 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China can get some inspiration from their discussions about ecological economy over the past half century, but it still needs us to explore and practice according to the reality of our country.

Keywords: Ecological economy; Ecological socialism school; Political economy; Socialist eco-civilization; Academic literature history

[责任编辑:李春明]

① 乔尔·科威尔:《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毁灭?》,杨燕飞、冯春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8-185页。

② 乔纳森·休斯:《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张晓琼、侯晓滨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82-283页。